

六朝江东士族文学研究

吴正岚 著

凤凰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六朝江东士族文学研究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六朝江东士族文学研究 / 吴正岚著. --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2019.12
ISBN 978-7-5506-3066-6

Ⅰ. ①六… Ⅱ. ①吴… Ⅲ. ①地方文学史－古代文学史－南京－六朝时代 Ⅳ. ①I209.953.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289949号

书　　名	六朝江东士族文学研究
著　　者	吴正岚
责任编辑	韩凤冉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025-83223462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fhcbs.com
照　　排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江阴金马印刷有限公司 江阴市滨江西路803号,邮编:214443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15.25
字　　数	410千字
版　　次	2019年12月第1版　2019年1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06-3066-6
定　　价	88.00元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电话:0510-86626799）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Supported by 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成果。

导　言

所谓“江东士族”，是指世居江东的吴姓士族。唐代柳芳将魏晋南北朝世族分为侨姓、吴姓、郡姓、虏姓四大类，其中“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新唐书·柳冲传》）。本书主要探讨两晋南朝时期江东士族文学的发展演变，在考察其背景时，则将江东士族的家学门风上溯至东汉。

依据家族类型的不同，江东士族有旧族和新贵之别。其中，吴郡张氏、陆氏、顾氏，会稽孔氏、虞氏、贺氏等世家大族，在东汉末年已濡染儒风，成为崇尚经明行修的文化士族，堪称江东旧族；此外，吴兴沈氏等新贵，世为江东雄豪，直至刘宋才开始折节好文，走上崇尚文化的道路。其家族文化竭力向门阀社会主流靠拢，但也不无与江东旧族相通之处。

江东士族中的旧族与新贵的文化取向虽有一定差异，但从婚姻、交游[①]等方面来看，旧族与新贵始终有着密切的交流。刘宋以后，吴兴沈氏在文学、儒学等各方面都跃居江东士族的核心地位，旧族与新贵已浑然一体[②]，因此本书将六朝江东的旧族与新贵的文学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

---

① 东汉时，沈约所出自的沈浒一系与陆氏通婚且交好（说详见第一章第二节《陆机学习江南歌谣的典范效应与南朝江东士族文学的复兴》）。

② 南齐以降，沈氏大儒辈出，江东旧族多就学于沈氏。如会稽旧姓孔休源曾就沈骥士受经，略通大义（《梁书·孔休源传》）；吴郡张及、会稽孔子云又传沈峻之业。（《南史·儒林·沈峻传》）。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一　六朝江东士族文学研究的现状概述

在前辈学者陈寅恪[①]、唐长孺[②]、周一良[③]、王伊同[④]等人对六朝门阀社会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近年来从门阀世族的角度考察六朝文化，正逐渐成为学术界较为重视的一种研究视角。尤其是中外史学界有关门阀制度与社会、政治、经济之关系的探索，已经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其中，中国台湾毛汉光撰有《两晋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⑤]，着重运用统计方法分析门阀士族如何从把持选举、严守门第等方面保持其政治地位。其后毛氏又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⑥]之作，以考察魏晋南北朝隋唐士族政治之变迁为主要内容。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⑦]在重新界定“门阀政治”这一概念的前提下，分析东晋政治格局、军事部署的变动，认为门阀士族仅在东晋时真正存在过，门阀与皇权共治是其存在形式。日本中村圭尔《六朝贵族制研究》[⑧]侧重于从官僚制度的变迁来研究门阀社会政治。个案研究则有日本守屋美都雄《六朝门阀的一研究——太原王

---

①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6月)、《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对六朝门阀社会的政治文化有精辟的论述。

② 唐长孺对六朝门阀政治制度的特征及其与学术文化、社会风尚的关系有深刻的论述。如《南朝寒人的兴起》(载《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士族的形成和升降》和《魏晋南朝的君父先后论》(载《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版)等文。

③ 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论述了南朝门阀官僚制度的变迁及南朝侨、吴士族的矛盾。

④ 王伊同《五朝门第》(成都：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43年版)。

⑤ 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委员会”1966年版。

⑥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年版。

⑦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⑧ 日本风间书房1987年版。

氏系谱考》[①]，又有叶妙娜对陈郡谢氏的仕宦、婚媾的研究等等[②]。

在门阀制度与学术文化的关系方面，陈寅恪先生《崔浩与寇谦之》一文提出了“东汉以后学术文化，其重心不在政治中心之首都，而分散于各地之名都大邑。是以地方大族之盛门乃为学术文化之所寄托……而汉族之学术文化变为地方化及家门化矣。故论学术，只有家学之可言，而学术文化与大族盛门常不可分离也”[③]的论点。实质上他是指出了从门阀制度的滥觞期——东汉开始，门阀社会的学术文化所具有的重要特征。钱穆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所撰的《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④]一文，从四部之学的发达、儒家礼学的重视、清谈风流的强调等方面，总论门第社会对学术文化的贡献与影响。日本吉川忠夫《六朝精神史研究》[⑤]在对六朝士大夫的学术思想、宗教信仰的考察中，也采取了从门阀制度和家族背景出发分析思想嬗变的视角。近年来有关门阀社会文化的个案研究的成果较为突出。萧华荣《簪缨世家》[⑥]和《华丽家族》[⑦]叙述了王谢高门的兴衰历史，对王谢家族的文化个性亦有所表现。日本吉川忠夫《王羲之——六朝贵族的世界》[⑧]通过叙述王羲之的生活、思想、信仰，表现门阀社会士族文化的特征。丁福林《东晋南朝的谢氏文学集团》不仅反映了谢氏文学创作的总貌，而且对谢氏家族文学集团的人物关系和文化活动有翔实的考证。程章灿老师《世族与六朝文

---

① 东京：日本出版会社 1951 年版。

② 参见叶氏《东晋南朝侨姓高门之仕宦——陈郡谢氏个案研究》(《中山大学学报》，1986 年第 3 期)、《东晋南朝侨姓士族之婚媾——陈郡谢氏个案研究》(《历史研究》，1986 年第 3 期)等文。

③ 《金明馆丛稿初编》，第 147—148 页。

④ 载《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三)(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 1981 年再版)。

⑤ 京都：同朋舍 1984 年版。

⑥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5 年版。

⑦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4 年版。

⑧ 东京：清水书院 1972 年版。

学》[①]着重考察世家大族的文化生活对文学观念、创作实践的影响，既有世族宗亲伦理与文学题材、文学集团与文学批评等关系的宏观分析，又有对陈郡谢氏等文学家族的个案研究。

迄今为止，侨姓士族、尤其是王谢高门一直是门阀社会文化研究的重点，而近年来对江东士族的研究，也开始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前辈学者已经注意到了门阀社会中侨、吴士族的政治矛盾、门第差别和文化冲突，如陈寅恪先生《述东晋王导之功业》[②]、《东晋南朝之吴语》[③]等文，均涉及到了侨、吴士族在政治上的冲突与依赖关系、文化上的隔阂与交融过程。又如周一良先生《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南齐书丘灵鞠传试释兼论南朝文武官位及清浊》[④]对南朝侨、吴士族在政治上的矛盾和吴姓士族政治地位的起落沉浮有精辟的论述。方北辰《魏晋南朝江东世家大族述论》[⑤]侧重于论述汉魏六朝时期江东世家大族的政治活动，分析了经济地理环境、江东世族集团结构对江东世族盛衰消长的影响。何启民《永嘉前后吴姓与侨姓关系之转变》、《中古南方门第——吴郡朱张顾陆四姓之比较研究》[⑥]等文考察了两晋南朝侨、吴士族政治利益的冲突和吴姓士族内部各家族的社会地位的升降。刘淑芬《六朝会稽士族》一文考察了会稽士族的谱系、家族的兴衰、政治上没落的原因以及会稽士族的豪强化等问题。[⑦]

有关江东士族学术文化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进展。唐长孺先生《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⑧]一文揭示了西晋时江东学风与中原学

---

①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
② 《金明馆丛稿初编》第 55—77 页。
③ 《金明馆丛稿二编》第 304—309 页。
④ 《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3—126 页。
⑤ 台北：文津出版社 1991 年版。
⑥ 《中古门第论集》，台湾学生书局 1978 年版。
⑦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十六本第二分，1985 年。
⑧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5 年版。

术的不同，并且认为江东士人重视儒学的特点在南朝时期也同样存在。方北辰《魏晋南朝江东世家大族述论》也概述了江东世家大族的文化活动。刘跃进《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①]则对永明文学集团中的南北士族的文化融合进行了深入分析。日本佐藤利行《入洛后的二陆について》[②]论述了陆机、陆云兄弟入洛以后与江东同乡的密切交往及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前述程章灿老师《世族与六朝文学》辟有专章论述吴郡张氏的家族文化特征及其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傅汉思《山阴孔氏》一文考察了汉唐时期会稽山阴孔氏的系谱、家族地位、政治盛衰、经济状况、对朝代更迭的态度等方面[③]。本人的博士论文《论六朝吴姓士族的文化特征》[④]第一次全面系统地考察了六朝江东士族的学术、信仰、文学等家学门风的独特风貌、发展演变及其社会背景；在此基础上，拙著《六朝江东士族的家学门风》[⑤]通过考察六朝江东士族家学门风的发展演变，分析了江东士族的学术、宗教和文学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更深入地认识六朝学术文化的复杂性。孙明君《两晋士族文学研究》[⑥]深入探究了两晋士族文学的特征、嬗变，其中包括陆机文学中的士族意识等问题。在此前后，关于江东士族文学的个案研究有王彦红《六朝吴郡张氏家族文化与文学研究》(2009 年曲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陈家红《六朝吴郡陆氏家族文化与文学研究》(2013 年上海师范大学硕士论文)，两者皆吸收了先行研究的基本思路，而后者更加全面地收集、整理了相关资料[⑦]。

---

①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 年版。

② 《日本中国学会报》，第 44 集，1992 年。

③ 《清华学报》新二卷第二号。

④ 南京大学 1999 年博士论文。

⑤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⑥ 中华书局 2010 年版。

⑦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有关六朝江东士族家学门风的研究成果颇丰，本书仅择其要者加以论述。

二　有待解决的问题

综观近年来的相关研究状况可以发现，学术界对六朝江东士族的学术文化特征已经做出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但仍有进一步开掘的必要。在江东士族文化的诸层面中，文学尤其值得重视。因为六朝江东士族中的张氏、陆氏、沈氏等文学家族代有才人，而且多次引领文学潮流的新变。然而，迄今为止，对于六朝江东士族文学，学界仅有一些论文和篇章有所论及，尚缺乏总体把握和专书研究。本书拟在本人多年来有关江东士族文化研究的基础上，从家学门风和地域文化的角度系统深入地考察六朝江东士族文学。具体来说，本书试图回答以下问题：

其一，如何理解“六朝江东士族”这一群体的文化内涵？以往的研究比较强调“六朝江东士族”作为一个门阀士族群体的意味。换言之，作为六朝吴姓士族文学，由于六朝时期南北士族的文化隔阂与冲突，江东士族的家学门风有别于侨姓主流文化，在学术上重儒而轻玄，在信仰方面或长期尊奉道教而不愿入佛，或重视观音信仰而有别于好尚佛教义理的主流风尚。相应地，江东士族文学也深受儒学影响而追求典雅、重视辞采。

与以往的单一视角有所不同，本书拟从门阀和地域的双重视角来考察江东士族文学。江东士族文学的发展与江东地域文化的关系不可忽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孙吴以来江南歌谣越来越多地渗入到文学创作之中，在意象建构、诗歌风韵甚至声律变革等方面，都成为文学创新的重要动力。

其二，如何理解六朝江东士族文学以崇尚典雅为基本风貌、而南齐时沈约能够引领声律论这一重要的文学新变？现行研究较多地考察了江东士族的“文笔弘雅”，本书拟探究江东士人雅俗论的发展演变，分析江东士人文论的折衷倾向与其接纳俗文学之间的关系。

其三，如何理解孙吴以来的文化传统对江东士族文学的影响？关于孙吴时期的江东学风，已有的研究多强调其崇尚儒学、保守汉代“经明行

修”学风的一面。本文拟考察孙吴时期江东禅学对六朝江东士族文学的影响。

概言之，本书的主要特点在于试图拓宽已有的以六朝门阀士族文化为本位的问题意识，突破以往把文学仅仅作为家学门风的一个层面的做法，改变“家学门风——文学”的单一视角，而引入了“地域文化——文学”等思路；与此同时，以考察六朝江东士族文学的兴衰为宗旨，全方位、多角度地探讨江东士族文学发展的动力，并着重对江东士族在南齐声律论中的贡献及其动力加以更深入的分析。

三　研究思路与方法

在考察六朝江东士族文学的过程中，本书所采取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可以概括为文献实证研究和多学科综合研究两个方面。

其一，本研究将在竭泽而渔地收集相关资料的基础上，通过文献实证来考察六朝江东士族文学。其中不仅包括域内现存的所有六朝文献，特别是先行研究重视得不够的佛、道两家资料，如金藏广胜寺本《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序》等；而且吸收流播海外的材料，如日本的唐抄《文选集注》、《日本世说新语注释集成》[①]等。本书附录三《论〈文选集注〉在六朝江东士族研究中的文献价值》即为这方面的尝试之一。

其二，本研究将运用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探究六朝江东士族文学与儒学、信仰等方面的互动关系。比如，六朝江东士族文学的主要理论背景是以崇儒为基本特征的家族学术，这一点构成了江东士族长期坚持道教和崇奉观音信仰的学术背景，但恪守道教和崇奉观音等宗教活动，也进一步巩固了江东士族文化圈，从而反过来促进了江东旧有学风的传承。

又如，六朝江东士族在信仰和文学方面都构成了源远流长的谱系，传承这一谱系的动力则是共同的江东地域文化传统和密切交往的江东

① 张伯伟编著《日本世说新语注释集成》，凤凰出版社 2019 年版。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士族文化圈。具体而论，在文学方面，西晋陆机树立了以温雅诗风兼容江南歌谣的典范；在佛教信仰方面，江东士族也有类似陆机的典范人物，即东晋时期的会稽谢敷(说详下)。

概言之，只有重视文学与江东士族文化各层面之间的互动关系，才能深入揭示六朝江东士族文学的独特风貌和思想背景。

四　创新之处

本书的创新之处在于：通过采取“家学门风——文学”、“地域文化——文学”等多重视角，揭示了江东士族文学以典雅为本而兼收俗文学的复杂性，分析了江东士族文学、儒学、信仰、地域文化等多层面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揭示六朝江东士族文学发展的动力。

一，在六朝江东士族文学特征方面提出了新的观点，揭示了六朝江东士族文学特征的复杂性在于以典雅为本而兼收俗文学。以往的研究仅强调六朝江东士族文学有别于门阀社会的主流文化、推崇典雅的一面，这一看法难以解释南齐沈约在永明声律论上的先驱地位，也不能说明江东士族对梁陈宫体诗创作的预流。本书在揭示江东士族以雅兼俗的特征时，通过以下三个核心环节加以论证：其一，江东士族文学以雅兼俗的追求，发轫于西晋陆机。陆机既崇尚华美典雅的文风，又吸收江南歌谣，为江东士族文学树立了典范。其二，以往的研究已经注意到江东士族对典雅文风的追求，本书则明确了这一文风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演变：西晋时期，陆机等人的诗文在内容上阐述儒家政治、伦理思想和抒发建功立业的抱负，于形式上好尚四言诗，讲究辞采的华美，追求温雅的文学风格。东晋和刘宋两世，玄言诗和山水诗先后成为文坛主流，都要求文人具备谈玄悟道的学术背景，是故崇奉儒学而玄学薄弱的江东士人几乎从文坛上销声匿迹，仅有的几个文人，如东晋陆冲、顾恺之，刘宋顾迈、张永等人，在创作上仍然追求温雅典丽，或气调警拔，或颇有古意；迄于南齐，江东文风对典雅的追求，主要表现为疏离轻柔细腻的新风，以刚健雄壮之气引人注目，如孔稚珪《白马篇》、虞羲《咏霍将军北伐》。萧梁

以后，江东士族文学开始与主流文学融为一体，但擅长写作雍容典雅的庙堂文学仍是他们最显著的标志。梁代张率和陆倕以辞义典雅著称，陈代虞荔、虞寄兄弟，陆琼及其子从典、陆琰及其弟瑜、从兄玠、从弟琛等六人都擅长庙堂之制。其三，就吸收江南歌谣一端而论，陆机模拟江南民歌的传统，在六朝江东文人间薪火相传，本书揭示了其中最突出的现象是陆机、沈约和张率先后写作同题乐府《日出东南隅行》，张率和陆琼又先后以杂言体写作乐府《长相思》。

二，本书还探究了吴郡陆氏、吴郡张氏、吴郡顾氏、吴兴沈氏、会稽孔氏、会稽虞氏等家族的文学个性与家学门风的关系。其中，吴郡陆氏无疑是江东士族文学的领军，其最大贡献在于西晋陆机树立了崇尚典雅文风、兼容江南歌谣的典范；吴郡张氏以“张文”著称，南齐时张融的文论以其独特的风貌令人瞩目，萧梁起张率既以文笔典雅著称，又写作艳情诗；吴郡顾氏文学最独特的贡献，当推刘宋时期吴郡顾觊之令其侄子顾愿所作《定命论》，其意义在于折射了东晋以来佛教“报应说”与中土定命论的融合。而且，在汉魏六朝“辩命论”系谱中，顾氏《定命论》有承上启下之功；吴兴沈氏文学的主要成就在于制作吴歌西曲和提倡四声论。在江东士族中，吴兴沈氏最为热衷于创制吴歌西曲，南齐时期，沈约成为提倡四声论的领军人物；会稽孔氏文学的意义主要在于传承陆机的典雅文风，尤其是孔稚珪的诗和文都体现出对江东士族文学儒雅文风的弘扬；会稽虞氏于东汉、孙吴时期奠定了经学基础，东晋后期，虞氏儒学逐渐衰落，虞氏文学日益兴盛，文风也呈现出兼容复古与趋新的多姿多彩的风貌。

三，在六朝江东士族文学的背景方面提出了新见，分析了江东士族文学、儒学、信仰、地域文化等多层面之间的互动关系，着力考察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指出南齐以降江东士族文学的复兴与学习江南歌谣之间的关系。崇尚典雅和吸收俗文学这两个层面在江东士族文学中的地位虽有主次之别，却先后创造了西晋和南齐两个时期的文学兴盛。关于西晋江东士族文学的辉煌成就与崇尚儒学的关系，学界已进行了充分的研究。

而以沈约为首的江东士人之所以能够在声律论、艳情诗等方面引领文坛风尚，则是由于江东士人将陆机开创的重视江南本土文化、吸收江南歌谣之风加以发扬光大。比如，陆机对江南歌谣的模拟，在江东士族中具有不言而喻的典范效应，成为齐梁之际沈约克服军功家族的心理障碍、积极吸收吴歌西曲的重要推动力。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江东士族依据其对于永明文学新变的看法，可以分为趋新和守旧两派。以沈约为代表的趋新派从吴歌西曲中吸收养分，成为四声说的领军人物；而张融和陆厥等守旧派或在文学新变方面有独特看法，或对四声新说提出质疑，这就表明他们接受陆机传统的方式，不是大胆地吸收吴歌西曲中的“蜂腰”、“鹤膝”等因素，而只是讲求诗文的自然声韵或古典声韵①。

（二）提出沈约与诵经僧人的交往对其把握字音的影响。关于南齐永明声律论的背景，以往的研究已经充分注意到四声与佛教文化的渊源，特别是梵语字音和印度诗律的影响②。实际上，众所周知，四声说的理论动力颇为多元，南朝民间歌谣辨别和协调声音之清浊轻重的做法，亦有惠于四声的创立③。由此可见，与字音有关的其它佛教活动，比如诵经，也可能为四声说提供理论资源。因此，本书另辟蹊径，着力考察提倡声律论的中坚力量沈约、周顒等人与僧人的交往，发现与沈、周二人交谊甚笃的僧尼多有关乎字音的诵经活动。所谓诵经僧尼，一是指以诵经著称、见收于《高僧传·诵经》的僧人，二是指尤其重视诵经的习禅僧尼。关于习禅与诵经的关系，本书注意到《安般守意经》多次提及诵经与习禅

① 说详见第四章第二节《论张融文学新变的独特方向及其对侨姓文化的批判》和第六章第三节《论沈约陆厥的声律之争与沈氏家族文化的关系》。

② 参见刘跃进《别求新声于异邦——介绍近年永明声病理论研究的重要进展》（《文学遗产》1999 年 4 期）。

③ 钟嵘《诗品序》“至平上去入，则余病未能；蜂腰鹤膝，闾里已具”，已揭示了四声说的产生与民间歌谣的关系（参见郭绍虞《蜂腰鹤膝解》，《社会科学战线》1979 年第 3 期）。

的关系，如金藏广胜寺本《安般守意经》卷上云："有三坐堕道：一为数息坐，二为诵经坐，三为闻经喜坐。"由此不难理解，《高僧传》"习禅"篇和"诵经"篇多载僧人的坐禅习诵。其中，以"禅诵为业"[①]的释慧约与沈、周二人的交情终身不渝；又如，沈约作有《比丘尼僧敬法师碑》、《南齐禅林寺尼净秀行状》[②]，对坐禅习诵的尼净秀和尼僧敬推崇备至。而周顒亦礼敬名列《高僧传》"诵经"篇的释法慧、擅长诵经的释法宣尼[③]。

诵经与领会字音的关系，可从以下两方面加以认识：其一，《四声指归》的作者释僧旻亦重视诵经、恢复了释道安讲前诵经的传统。其二，《高僧传·诵经传论》指出了诵经讲求"音吐遒亮，文字分明"[④]，因而沈约、周顒与诵经僧人的交往一定有助于他们对字音的领悟，进而推动四声论的成熟。

（三）在六朝江东士族文学的背景方面，本书还有以下突破：一是指出六朝江东士族的两种"太极论"都落后于时代思潮，分析南齐张融、孔稚珪之太极论的滞后与家族文化观念之间的关系。在六朝江东士族的学术发展过程中，西晋时纪瞻与顾荣在赴洛途中论《易》"太极"，南齐孔稚珪在给竟陵王萧子良的答书中论"易家有太极"，这两种"太极"论之间的联系尚未得到学者的注意。两种"太极"说分别滞后于王弼的"以无为本"和周顒的"非有非无"论。南齐张融、孔稚珪等人的"太极"论落后于时代思潮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有意识地打造家族文化个性和弘扬汉代"经明行修"的学风。这表现为他们在佛道论争中强调道教乃其门业、视改变信仰为变节行为。

二是在江东士族的佛学方面，本书有以下两个突破点：其一，分析了汉末三国时期会稽陈慧的禅学贡献及其被遮蔽的原因。陈慧是《安般守

① ［唐］道宣撰、郭绍林点校《续高僧传》卷六，中华书局 2014 年版，第 183 页。

② 分别见《沈约集校笺》卷七，第 224 页、第 227 页。

③ ［梁］释宝唱著、王孺童校注《比丘尼传校注》卷四，中华书局 2006 年版，第 213 页。

④ 《高僧传》卷十二，第 475 页。

意经》的主要注者，且很可能注释了《阴持入经》，于弘扬安世高之学厥功甚伟。然而由于释道安《综理众经目录》未及陈慧，《安般注序》亦只提康僧会而不及陈慧，会稽陈慧注释佛经的贡献便隐而不彰了。这一考察有助于了解六朝江东士族重禅学的源头。其二，揭示出东晋谢敷在江东士族佛教信仰方面的先导作用，正如陆机在江东士族文学上的典范效应。一方面，笔者的先行研究指出，六朝江东士族佛教信仰的独特之处在于：吴郡张氏、会稽谢氏、吴郡陆氏等家族自东晋以来便重视观音信仰，有别于六朝多数士人的好尚佛教义理①。这方面的先驱，便是会稽谢敷。他颇为注意收集有关观音信仰的传说，撰《光世音应验记》一卷，为张演《续光世音应验记》、齐陆杲《系观世音应验记》导夫先路。另一方面，本书指出，谢敷在弘扬孙吴以来的江东禅学方面也做出了不凡的贡献。据《出三藏记集》，谢敷注《安般守意经》并作序②，又为支越、支法护和竺叔兰所译《首楞严经》的三个本子作合注③。《安般守意经》为安世高译出后，由会稽陈慧首次撰注义，康僧会担任助手；又谢敷合注三种《首楞严经》时，以支谦所定者为母本。支敏度《合首楞严经记》认为此本乃支谦删改支谶所译而成④。可知这两部佛经的译注承载着孙吴时期的江东禅学，作为会稽土著的谢敷，通过此举来弘扬江东文化传统的用心，不言可喻。这一考察的意义在于说明了江东士族在佛教方面重视观音信仰和禅学的独特倾向可谓其来有自，宋齐时期沈约与禅诵僧人的交往，也可上溯至此源头。

---

① 参见拙作《论六朝江东士族信仰的变迁》，载《中国学术与中国思想史》（《思想家》Ⅱ，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2 年 4 月版）。无独有偶，在拙作发表之后两个月，纪志昌《东晋居士谢敷考》亦注意到“谢、张、陆均为吴地会稽士族，笔者以为这部应验记出现的最大意义，即是象征了吴地士族在家奉佛其中之一种信仰内容。”（《汉学研究》第 20 卷第 1 期，民国 91 年 6 月）

② ［梁］释僧祐撰，苏晋仁、萧鍊子点校《出三藏记集》卷六，中华书局 1995 年版，第 245—247 页。

③ 《出三藏记集》卷七，第 270 页。又王琰《冥祥记》称谢敷“手写《首楞严经》”（鲁迅《古小说钩沉》，第 472—473 页）。

④ 《出三藏记集》卷七，第 270 页。

目　录

导　言 …… 1

一　六朝江东士族文学研究的现状概述 …… 2

二　有待解决的问题 …… 5

三　研究思路与方法 …… 7

四　创新之处 …… 8

第一章　以雅兼俗:六朝江东士族文学的演变和特征 …… 1

第一节　江东士族的典雅文风与儒学背景 …… 1

一　西晋:儒学修养与文学的辉煌 …… 1

二　东晋至刘宋:诗风温雅与文学衰落 …… 6

三　南齐:文学复苏与典丽、刚健的文风 …… 8

四　梁陈:擅长庙堂文学与风格多样化 …… 13

第二节　陆机学习江南歌谣的典范效应与南朝江东士族文学的复兴 …… 15

一　西晋:陆机模拟吴歌而作《吴趋行》、《日出东南隅行》 …… 16

二　晋宋:杨方、孔宁子和沈氏对江南歌谣的学习 …… 18

三　齐梁陈:江东士族以雅兼俗与文学复兴 …… 21

四　余论 …… 29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